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方法论中的传统智慧

石书臣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34)

摘要: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的思想精华和合理内核,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方法论的一个重要来源,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得到传承和发展,主要表现在从“经世致用”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从“一多统一”到主导性与多样性相结合、从“循序渐进”到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从“重视整体”到整体思维与协调发展相结合、从“贵和尚中”到和谐相处与求同存异相结合、从“知行合一”到认识与实践相统一等方面。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方法论中的传统智慧,有利于进一步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方法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思维方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6)02-0011-07

把马克思主义根植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在思维方法上既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坚持和发展,也打上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烙印。思维方式是看待事物的角度、方式和方法,思维方法属于思维方式范畴,是思维方式具体而集中的体现。尽管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其中所蕴含的思想精华和合理内核,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方法论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而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得到进一步传承和发展。

一、从“经世致用”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经世致用”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居主导地位的文化价值观,《辞海》中解释为:“明清之际主张学问有益于国家的学术思潮”。“经世致用”思想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儒学,儒家的“入世哲学”就具有很强的经世的传统。孔子周游列国,教授弟子三千,就是为了宣扬和实现他理想中的社会秩序。儒家思想教导人们如何做人行事,告诫统治者如何治国理政。孔子就是积极入世的典型代表。当季路问他侍奉鬼神之事时,孔子回答:“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他的弟子子夏主张“仕而优则学,学

而优则仕”(《论语·子张》),鼓励人们在自身修养、知识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可以步入仕途,干出一番事业。汉代董仲舒、何休等代表的“今文经学”主张通经致用,借阐发经文的微言大义,为汉代封建统治寻找理论根据。南宋时期吕祖谦等批评当时理学家空谈心性命理,主张明理躬行,学以致用。明末清初,经世致用之学大兴,形成了一股有影响力的实学思潮,代表人物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顾炎武强调“凡文之不关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与人书三》),反映出儒家思想更趋务实。晚清政府腐败无能,帝国主义侵略日益加深,国家面临严重的社会危机,林则徐、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等再一次倡导“经世致用”,魏源还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但他们的政治理想已与传统儒家有了很大不同,而是试图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融中寻找一条救国自强之路。

“经世致用”的传统思维虽然带有一定的功利性色彩,但它所体现的我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务实精神及其“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值得肯定和传承。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方法论中的主要体现就是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务实性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始终贯穿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务实性原则。务实性就是讲实

收稿日期:2015-09-17

作者简介:石书臣(1965—),男,河北邢台人,教授,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研究。

用,重实效,解决实际问题,就是实事求是。这与“经世致用”的传统思维无疑有着内在的联系,体现了对“经世致用”精华思想的传承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创立者邓小平就是一个富有务实精神的马克思主义者,早在1962年他就曾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1]323}。改革开放时期,他认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在如何检验改革成效问题上,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此外,他还提出和强调“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学马列要精要管用”“发展是硬道理”“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等富有哲理性的语言,这些都体现了他的务实性思维。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样体现着理论联系实际的思维方法。中国现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当今中国最大的实际。江泽民指出:“建国以后的前三十年,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上和实践中发生的一些严重失误,归根到底都是由于脱离了这个实际;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二十年,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上和实践中取得的巨大成功,归根到底都是由于符合了这个实际。”^{[2]251}为此,江泽民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党的一切工作都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来进行。同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正是在面临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不断地回答和解决实际工作中出现的许多新课题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

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彰显着务实的思维方法。在新时期新阶段,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一些新问题、新矛盾也开始凸显,特别是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拉大、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生态和环境问题严峻等现象严重制约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为此,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胡锦涛还强调:“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紧密联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坚持讲实话、出实招、办实事、务实效,把工作的着力点真正放到研究解决改革发展稳定中的重大问题上,放到研究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紧迫问题上,放到研究解决党的建设中的突出问题上。”^{[3]731}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强调要从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入手,加强和改进宣传思想工作,这也体现了务实性的思维方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以更加务实的作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发展。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在谈及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时,他认为一定要适合国家的实际和国情,“‘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4]273}他坚决反对那种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不实作风,并多次强调抓工作落实要有“钉钉子”的精神,纠治“四风”要有“钉钉子”的精神,走群众路线要有“钉钉子”的精神。同时,习近平关于反腐败、纠“四风”方面的重要思想以及所取得的成效更是深得民心,赢得人民群众的广泛赞誉。

二、从“一多统一”到主导性与多样性相结合

一与多,是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中关于整体与个体、一般与个别、统一性与多样性等辩证关系的一对重要范畴。

道教始祖老子认为,一与多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第四十二章),一可以衍生为多;另一方面,“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道德经》第三十九章),在多中又包含着一。王弼推衍了老子的一多理论,认为万物之生皆由一而来,故一是多的主宰。因此,一和多的关系也是“主宰与万物”的关系。

佛教华严宗对于一多关系的理解,是为了论证佛身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又显现于一切现象界;而每一个现象界虽各不相同,但却又都显现同一个佛身的整体,而不是它的一部分。所以,华严宗认为,“无有不多之一”,也“无有不一之多”(《华严经探玄记》)。也就是说,一与多互相包容而为一体。一是多的一,所以才称为一;而多又是包容一的多,所以才称为多。这深刻体现了华严宗的“一多相容”思想。

从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来看,儒家思想在古代封建社会的影响力最大,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儒家思想并不是孤立地发展,在不同程度上也吸收了道、墨、法等思想中优秀、合理的部分。这实际上体现了“主导”与“多样”辩证统一的关系。此外,儒家的天人合一和理一分殊等思想也包含了一与多的辩证统一关系。天与人的一多关系涉及的是自然宇宙整体与人类个体的关系问题。朱熹的“理一分殊”论认为,从普遍之理表现为具体之理来说,一表现为多;从多的方面言,多即涵摄一。王夫之则强调“一以统万”。他说:“一以统万者,达天者也。今夫天,则浑然

一而已矣。天居一以统万,圣合万而皆一。”(《尚书引义》)这都体现了儒家一与多辩证统一的主张。

“一多统一”的思维方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方法论中的主要体现就是主导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思维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方法论的基本原则,就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多样化、多元化的背景下处理好主导性与多样性的关系。这一思维方法具体表现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党的建设、对外关系等方面的思想和理论。

在经济建设方面,根据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提出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等思想,并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是主体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相统一的制度。坚持主体性,才能确保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同时,结合多样性有利于在我国生产力不发达、资金缺乏的情况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的发展。

在政治建设方面,坚持和发展了我们党关于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理论,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理论。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强调把立足国情与借鉴外国有益成果相结合。在实现祖国统一问题上,邓小平强调:“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但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比如香港、台湾。”^{[5]59}在统一战线问题上,胡锦涛指出:“要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巩固统一战线的思想政治基础,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6]29}这些思想实质上都体现了主导性与多样性辩证统一的思维方法。

在文化建设方面,提出了“发挥马克思主义主导作用”“先进性与广泛性相结合”“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激发社会正能量”等一系列思想。先进性要求、引领作用、正能量体现了文化建设的主导性;广泛性要求、包容多样等则体现了文化建设的多样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倡导”,即体现了鲜明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性质和要求,又体现了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承接和对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的吸收借鉴,是坚持主导性与多样性辩证统一思维方法的新成果。

此外,在社会建设方面,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和谐的本质在于统一多种因素的

差异与协调”^{[7]3};在党的建设方面,提出了关于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思想;在对外关系中,提出了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维护世界多样性相统一的思想等,这些也都体现了主导性与多样性辩证统一的思维方法。

三、从“循序渐进”到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

循序渐进,是指按照一定的顺序和步骤逐渐地进步。这一思想在我国由来已久,主要体现在知识学习和教育方法等方面。老子说过:“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老子》第六十四章)意思是说,做事情尤其是学习知识,要注重积累,厚积薄发,不能急于求成。孔子也说“欲速则不达”,他还主张“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意思是说学习要注意回顾,温习旧知识,才能有新的理解和体会。孟子以流水做比喻,说明学习必须循序渐进。他说:“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孟子·尽心上》)在《孟子·公孙丑上》篇中还讲了一个“揠苗助长”的故事。荀子更是深刻地指出:“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荀子·劝学》)这不仅强调了循序渐进的重要性,也包含着量变与质变的辩证关系。朱熹明确提出了“循序渐进”的概念,他说:“但知下学而自然上达,此但自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渐进耳。”(《四书集注》)他还把“循序渐进”作为其读书的方法,指出:“读书之法,当循序而有常。”(《朱子读书法》)他认为,读书必须遵循一定的顺序,只有这样才能体会书中的道理。王夫之也说:“有初学难而后易者,有初学易而后难者,因其序则皆可使之易。”(《张子正蒙注》卷四)也就是说,在学习上只要是根据循序渐进的方法学习,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最终都会得心应手。这些思想虽然多是强调学习,但其启示意义具有普遍性。

“循序渐进”的传统思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方法论中的主要体现和发展,就是注重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的思维方法。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

一是五年计划和规划的制定和实施。从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已经连续编制了10个“五年计划”和两个“五年规划”,“十三五”规划正在制定过程之中。五年计划和规划的制度安排体现了顶层设计,而它的连续制订和实施又体现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和渐进性。但是,五年计划也出现过

较大的失误,在“二五”计划实施期间,由于受到“大跃进”的影响,计划指标被不断修改,严重违背了客观规律。“三五”“四五”“五五”计划也都存在着严重的失误,盲目地追求高指标、高速度,忽视了发展的阶段性、渐进性,结果给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破坏。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更加注重科学制定五年计划,并由“计划”向“规划”转变。“‘规划’代替‘计划’是我国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这标志着我国在经济运行方面更加成熟,开始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要求政府工作由直接干预经济向间接调控经济转变。政府工作重点由制定指令性计划,转向提供战略性、前瞻性的指导规划,由直接参与经济发展,转向提供公共物品、调控宏观经济。”^[8]

二是渐进式的改革和发展思路。我国的改革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没有经验可循,邓小平强调要“摸着石头过河”“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等,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特别是注重先试验后推广,先在局部地区进行小范围的实验,通过小范围实验,积累有关经验后再大范围推广。这样做,可以使干部群众逐步适应这种改革,降低改革的阻力。比如,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创办深圳特区等做法都成为先试验后推广的典范。胡锦涛强调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也体现了循序渐进的思维方法。习近平用“扣扣子”来勉励大学生迈好人生第一步:“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4]172}这同样体现了循序渐进的思维方法。

三是有步骤的发展战略。邓小平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所以,虽然邓小平强调“摸着石头过河”,但实际上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注重顶层设计,他根据我国的实际国情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还提出“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的带动后富的,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我国在提前实现了“三步走”的第一步和第二步战略目标之后,为了把第二步战略和第三步战略很好地衔接起来,党的十五大把“三步走”战略的第三步进一步具体化,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对这“两个一百年”目标进一步提出了更高、更明确、更具体的要求,从而使“三步走”的战略和步骤更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这种循序渐进的特点,纠正了过去在战略目标上超越历史阶段的急躁冒进的做法,体现了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的思维方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更加彰显了这种思维方法。

四、从“重视整体”到整体思维与协调发展相结合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重视整体的传统。“重视整体”,是从整体出发处理整体与个体关系的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要表现如下:①家国一体的思想。比如,《礼记·大学》中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王阳明主张“亲吾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视天下为一家,中国犹一人。”(《大学问》)这些思想都体现了把个人、家庭与国家紧密结合起来的家国一体观。②天下为先的思想。爱国精神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具体表现。孟子所谓“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司马迁“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都体现出中国人对国家和民族的强烈归属感、认同感和责任感。③崇尚统一的思想。《诗经》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礼记·礼运》中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孟子明确主张“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荀子主张“一天下”(《荀子·王霸》),“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儒效》)。两千多年来,中国历史上虽呈现“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之势,但国家统一一直是主流。另外,还形成了八卦、六十四卦、五行生克等整体结构模式及天人合一的宇宙整体观等。

这类思维方式虽然受封建等级制度的制约,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个体利益,但家国一体、天下为先、崇尚统一、天人合一等思想的精华,仍然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方法论之中。其主要表现就是强调整体思维和协调发展相结合。整体思维要求从整体和全面的视角把握事物的性质、事物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协调发展则要求整体各部分之间的和谐一致、配合得当。强调整体思维和协调发展相结合,就是既要注重从整体出发,又要注重整体与部分、国家与个人的内在统一和各部分之间的协调发展。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针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就明确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建设方针。这一方针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指引作用,在多个领

域都有体现,如: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手抓发展经济,一手抓法制建设等。在发展目标上,他强调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两手抓、共同富裕等都体现了整体思维与协调发展相结合的思维方式。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位一体全面发展的目标。全面小康、三位一体同样体现了这一思维方式。胡锦涛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则是关于发展的整体思维和协调理念。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他提出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倡导”也体现了国家、社会、个人3个层面要求的统一。他还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四位一体”和“五位一体”建设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的提法和目标,也都体现了这一思维方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并阐释实现中国梦,中国梦不仅体现国家、社会、个人3个层面的目标,也强调国家梦与个人梦的有机统一,体现了“家国一体”的传统整体思维。他还提出“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特别是反复强调改革开放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各级领导干部要有整体思维、系统思维、战略思维,“要加强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4]68},体现了对这一思维方式的运用和发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把“协调”确立为我们党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

五、从“贵和尚中”到和谐 相处与求同存异相结合

“贵和尚中”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思维方式。“和”是指和谐、和平。“中”是中庸之道,不走极端。“贵和尚中”是在处理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人与自然的等方面以和为贵、选择折中的思维方式。主要体现在:①“大同”思想。“大同”是中国古代对理想社会的一种称谓。《礼记·礼运》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儒家还把比“大同”思想较低级的一种社会称为“小康”。这反映出古人对和谐社会的美好向往。②以和为贵。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第四十二章)孔子明确提出:“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孟子进一步提出:“天

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张载则提出了“一物两体”“仇必和而解”的观点,他说:“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正蒙·太和篇》)意思是,一切现象都存在着对立的两个方面,对立的两个方面必会产生冲突,冲突的结局归于和解,而和解是中国社会中冲突双方理想的结局。③和而不同。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意思是君子讲和谐但并不盲从附和,敢于坚持原则,阐述自己的思想和意见;小人则处处盲从附和,不讲原则,不敢提出自己的见解,却不能与别人和谐相处。《国语·郑语》中也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这就是说,只有不同事物的和谐、融合,才能取长补短,产生新的事物,而如果完全相同一致,则会停留在原有的状态,无法继续发展。④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基本观点是,人与自然是一体,人应该遵循而不是违背自然规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老子曾提出“天人玄同”的思想,主张人应该杜绝一切违背天道的行为。庄子进一步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主张人与自然融合一体。董仲舒也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张载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概念。⑤“中庸”思想。“中庸”是孔子的一个重要思想,它有3点基本主张:一是“适度”,即孔子所说的“过犹不及”。二是“时中”,强调君子随时做到适中。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中庸》)三是“中和”,意思是经过对于两端的调整而达到和谐。要把握好“中”,就需要在“两端”之间往返地调整以渐趋于和谐。《中庸》篇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意思是指若达到不偏不倚、不走极端、十分和谐的境界,天地各在其位,万物便生长繁育了。

弘扬“贵和尚中”的传统思维方式,在现代社会日益多样化、多元化的背景下,不仅强调“和为贵”,而且强调“和而不同”。追求和谐的实质,不是去异为一,而是在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求同存异,聚同化异。这种思维方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方法论中的主要体现,就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强调和谐相处与求同存异相结合。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自古以来就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社会理想。新世纪以来,我国进入到了一个社会

经济结构剧烈变化、各种利益矛盾日益复杂、社会稳定问题非常突出、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的新阶段。为此,在党的十六大上,我们党就把“社会更加和谐”确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又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和“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大把“和谐”“平等”“友善”等确立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构建和谐社会,内在要求贯彻和谐相处与求同存异相结合的思维方法。

二是构建和谐世界的理论。主张构建和谐世界,是在外交政策中贯彻和谐相处与求同存异相结合思维方法的集中表现。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改革开放之初,在处理与周边邻国的领土、领海争议时,邓小平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政策,及时改善了与周边邻国的关系。在党的十六大上,江泽民明确指出:“积极促进世界多极化,推动多种力量和谐并存……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9]566-567}胡锦涛在2005年4月参加亚非峰会时第一次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主张,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他又指出“我们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6]46}习近平也强调:“零和思维已经过时,我们必须走出一条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新路子。”^{[4]250}世界多极化是当今国际形势的一个突出特点,各国之间的差异是不可避免的,进而也就会存在冲突和矛盾,因此,秉持“和而不同”,尊重每个国家的差异(如文化差异、政治制度差异等),倡导“和为贵”,用和平手段取代武力解决矛盾和冲突,构建和谐世界,意义更加重大。

三是建设生态文明的理论。建设生态文明与中国“天人合一”传统思维方式具有内在的联系,是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贯彻和谐相处与求同存异相结合的思维方法的集中表现。改革开放给我国带来巨大变化和快速发展,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特别是伴随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为此,党的十六大报告就明确提出了“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的目标。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命题,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把生态文明建设确立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五位一体”目标之一。2015年5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这些都体现了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维方式。

六、从“知行合一”到认识与实践相统一

“知行合一”的传统思维是在中国古代思想家探讨知与行的关系中逐步形成的,其实质在于强调知与行的统一,现代含义就是认识与实践的统一。早在《论语》中就有反映孔子知行观的语句,如“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等,但孔子没有明确指出知和行的统一问题。荀子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荀子·儒效》)“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荀子·修身》)荀子的知行观虽然强调了知与行的关系,但更注重实际行动,仍然没能达到“知行合一”的高度。到程朱理学时期,程颢和程颐是重视知而轻视行的,而朱熹则认为,知先于行,行重于知,他还提出“知行相发”“知行并进”的观点。但王阳明批评他们依然是把知与行分为两截,进而明确提出“知行合一”的观点,他认为知和行是“合一并进”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传习录》)。从而超越了传统知行观中对知行分先后轻重的观点。他的思想虽然也带有一定的局限性,特别是过分强调其良知道德理性的价值,而忽略了知识理性的客观性及其合理性,但其主张知与行辩证统一的精神内核一直影响至今。

“知行合一”的传统思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方法论中的主要体现是坚持认识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认识与实践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同时也传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知行合一”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整个过程都贯彻了认识与实践相统一的原理。主要体现在3个环节:

一是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学习。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伟大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每一个重要历史时期,都强调理论建设。过去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革开放以后,又相继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充分反映了我们党对理论建设和理论发展的一贯重视,并指引我们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同时,我们党一直非常重视理论学习。邓小平指出:“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学习什么?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10]153}江泽民从领导干部要“讲学习、讲政治、

讲正气”的高度强调了领导干部学习的重要性。党的十六大以后,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大战略任务,并建立了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习近平进一步强调在全党大兴学习之风,依靠学习走向未来,他还强调:“首先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也是领导干部必须普遍掌握的工作制胜的看家本领。”^{[4]404}

二是重视实践和践行。粉碎“四人帮”以后,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邓小平强调实践标准,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在1992年南行讲话时他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问题是用实践来回答的,城市改革的问题也要用实践来回答。实践这个标准最硬,它不会做假。”^{[11]1340}他还提出了检验改革成效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江泽民也指出:“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2]12}胡锦涛强调:“求真务实,要紧紧围绕落实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来进行,最重要的是付诸实践、见诸行动,取得成效。”^{[3]731}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复强调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钉钉子”等精神抓工作落实,并对领导干部提出“三严三实”的要求,这些都是对实践和践行环节的重视。

三是强调认识与实践相统一。党的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根据邓小平的论述,对党的思想路线作了如下表述:“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江泽民指出:“理论是什么?理论就是对实践的总结。一切科学的理论,总是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指导实践,同时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自己。”^[12]胡锦涛提出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等命题,也是理论形态与实践形态的有机统一。习近平进一步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践、理论、制度紧密结合的,既把成功的实践上升为理论,又以正确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还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方针政策及时上升为党和国家的制度。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就特在其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上,特就特在其实现途径、行动指南、根本保障的内在联系上,特就特在这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上。”^{[4]9}他还多次强调要坚持知行合一的原则,比如,2014年1月20日在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议上强调,“知”是基础、是前提,“行”是重点、是关键,必须以知促行、以行促知,做到知行合一;2014年5月24日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贵在坚持知行合一、坚持行胜于言,等等。这些思想无不贯穿了知与行、认识与实践相统一的思维方法。

总之,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的积累,虽然其中也有糟粕、更遭受过破坏,但其主体和精华仍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本。”^[13]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方法论,一定要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传承好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的精华和合理内核,剔除其糟粕,克服其局限性,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富有中国元素,更有利于增强中国人民的共识和认同,成为引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行动指南。

参考文献:

- [1]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2] 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3]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 [4]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 [5]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6]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7] 李君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 [8] 王志远.站在十一级台阶上的中国[J].中国经济周刊,2009(37):10-24.
- [9] 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10]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11] 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 [12] 江泽民.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纪念邓小平同志逝世一周年[J].求是,1998(4):160-162.
- [13] 李克强.李克强与文史馆员谈文论道[N].光明日报,2015-04-08(1).